

希伯来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姜宗强^{1,2}

(1.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2. 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神说”、“子曰”、“什么是……”分别代表着古代希伯来、中国、希腊文化中的形式化了的三种不同言说方式。无论是中国古代孔子的言说特征, 还是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 似乎都缺乏“神说”这种希伯来先知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文本层面。通过论证强调了古代希伯来先知这种独特的“神言”的言说特征, 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孔子言说特征的不同, 以及带给我们今天思考和反观汉民族古代伦理思想体系的启迪。并指出当代学者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更侧重于希腊文明, 而对希伯来文明较少着墨这一不平衡现状。

关键词: 希腊文明; 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先知; 伦理观; 言说方式; 孔子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1)04-0038-06

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并称为“两希文明”, 被誉为哺育后世西方文化成长的“两只乳房”^[1]。如果简单地说, 希腊文明影响了西方人的科学观念, 那么, 希伯来文明作为《圣经》的有机组成部分, 则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伦理和道德观。因此, 在今天, 当我们比较和探讨中西伦理精神的性质和差异时, 对体现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型宗教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 就可以提供反省、审视我们自身民族文化伦理传统的另一个异质文化的参照系和新的视角。因此,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体现在希伯来圣经书卷中有关先知宗教的文本诠释, 揭示出《圣经》先知型宗教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与中国先秦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伦理观与言说方式的不同。这种外来异质文化的不同的言说方式, 可以提供给我们反省自身儒家文化伦理传统的新视角, 也可以增强我们思考自身文化传统时所应持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

一、作为启示宗教的圣经文本

启示宗教通常是以神灵与人类的交流和沟通为基础的。世界三大一神论宗教: 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都可视做启示宗教。“启示”的含义, 是“指超越者或神圣者(真主或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向人自我揭示或显现”^[2]。

圣经中, 上帝的启示常常通过“耶和华说”, 或

者“神说”、“上帝说”这样的方式来表达^[3]。换言之, 启示宗教文本的语言特征主要是“神言式”的, 即神或上帝作为文本言说的主角或主语。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创世记》和《论语》的开篇, 这两种不同传统的文本特征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说: “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籽的莱蔬……”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神说: “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

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子曰: “巧言令色, 鲜矣仁。”

子曰: “道千乘之国……”

子曰: “弟子, 入则孝……”

子曰: “君子不重, 则不威……”

子曰: “父在, 观其志……”

一个是“神说”, 另一个是“子曰”。一个文本的言说方式是“神本的”, 另一个文本的言说方式则是“人本的”。对“神本的”更准确的界定就是: 圣经文本是以上帝作为言说主角的独特话语方式来展示启示宗教的内容的。

根据这种启示宗教的特点, 可以进一步界定: 1) “启示”这种言说方式的方向性——是神自上而下发出的话, 并不是人向上经过努力就可以获

收稿日期: 2011-05-22

基金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资助骨干项目“希伯来先知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比较与会通”

作者简介: 姜宗强(1968—), 男, 宁夏吴忠人, 副教授, 兰州大学兼职研究员, 从事希伯来圣经和西方哲学研究。

得的知识或经验。2) 获得并接受神的启示的人,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被神选中,因而具有某种特殊宗教经验的人。3) 这种因上帝的“蒙召”而具有某种特殊宗教经验,去向公众传达上帝“话语”的人,就被称做“先知”。4)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神是言说的主体,而非人是言说的主体。即便先知,也只是神的话语的“传声筒”,或者说,是神的话语的“代言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德国哲学家韦伯(Max Weber)将古代近东地区的“伦理型先知”界定为:“先知主要只是个宣扬神及其意志的工具。”^{[4]55-56}并据此断定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完全看不出这种先知出现的可能,关键在于中国经典中“缺乏一个人格化、超越性及伦理性的神祇。”^{[4]56}韦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文化传统中无西方文化传统中所理解的犹太—基督教系统中的伦理型先知因素。

二、希伯来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怎样从希伯来圣经先知书卷中,更具体地搞清楚,韦伯所说的“伦理型先知”的伦理观与言说方式究竟有何更具体的特点?

(一)“先知”的词源学讨论

希伯来圣经中与“先知”含义相关的词汇共有四个:1) 先知(hōzeh); 2) 先知(rō'eh); 3) 神人('iš hā'elōhīm); 4) 先知(nābī')。根据威尔逊(R. R. Wilson)^{[5]136-141}、彼得森(D. L. Petersen)^[6]等学者的研究,真正最常用的“先知”字汇是nābī'。这个字汇出现的次数,比其余三个字汇出现的次数都要多。nābī'的基本含义,包括:1) 主动式(hithpa'el): 神游象外。2) 被动式(niphal): 直接的字面意思是——在某种激动或灵感状态下的话语源源不断地涌出。与之相关的宗教现象则可能是“神灵附体”后的“受感说话”^[7]。多数圣经研究学者同意这个词义的被动式,即神灵附体后的“受感说话”,更符合先知书卷的文本特征^{[8]4-6}。所以,我国近代旧约研究专家李荣芳曾经将希伯来语中的“先知”翻译为“舌人”,即受上帝灵的感动而传达“神言”的上帝的喉舌^①。所以先知在说话演讲时,总是冠以这样的固定格式:“耶和华如此说”,或“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种固定格式被认为是先知话语所特有的格式——“信使格式”。

(二)先知话语的典型格式——信使格式

“耶和华如此说”,或“这是耶和华说的”,贯穿很多先知书卷,成为区分先知话语的一个主要标志。限

于篇幅,笔者仅以《阿摩司书》为例,说明这种“信使格式”在先知书卷中出现的频繁性和广泛性。其中,最典型、最工整的格式出现在1-2章“审判列国的神谕”中。除此之外,这样的信使格式也贯穿该书的其余部分,如,3: 10b, 11a, 12a, 13a, 15b; 4: 3b, 5b, 6b, 8b, 9b, 10b, 11b; 5: 3a, 4a, 16a, 17b, 27b; 6: 8a, 14a; 7: 17a; 8: 3a, 7a, 9a, 11a; 9: 7a, 8b, 12b, 13a, 15b。从这个“信使格式”遍布的广泛性上,我们可以充分注意到先知书卷典型的“神言”特征。这个特征既不同于希腊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也不同于中国孔子的言说特征。后两个传统都是以“人言”为主要的言述特征^{[9]137-202}。

(三)为何会有这样“神本的”言说方式?

为何会有这样“神本的”言说方式? 宗教信仰者的解释是:因为存在上帝,所以必然存在上帝与人际会相遇的神秘现象,也必然存在人接受上帝“话”和“启示”时的这种沟通方式。但是,笔者更愿意接受文化人类学家的解释。

威尔逊指出:这个问题实际牵涉到古代以色列先知预言的起源问题,而以色列先知起源的问题,并不能孤立在古代以色列的旧约经文世界中,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为此,威尔逊广泛利用人类学家考察的研究成果,将研究的触角扩大到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巴勒斯坦等广大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宗教文化现象和宗教经验做了细致的分类研究。在一般性地区分了萨满(shaman)、女巫(witch)、术士(sorcerer)、灵媒(medium)、占卜者(diviner)、祭司(priest)、神秘主义者(mystic)、调停者(intermediary)几种宗教角色之后,“神灵附体”(possession)这个词取代“神游象外”(ecstasy/trance)这个词,来表述以色列先知预言的独特性。因为“神游象外”是一个生理、身体异于常态的概念,它常常伴有注意力、记忆力、集中力、判断力改变,时间感扭曲,这些特征并不一定是由“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由“神灵附体”之外的种种原因所引起。“神灵附体”则是一个解释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如何沟通的宗教文化概念,指神灵进入到这个人的身体内说话,实质说话的是神灵。如果是女神灵进入男身,则该男身表现的是女人的音调及表情,反之亦然^{[5]3-36}。总之,从威尔逊的研究中可以推断:古代以色列先知的“神言”言说方式,很可能和几千年前古代近东地理文化环境中的灵媒、巫术等原始文化流行的大环境有关。但是,学者们也强调“神灵附体”的行为模式中更多

① 中文“先知”一词,最早出于《孟子·万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传达的是神的“道德诫命”，而将以色列正典先知与周围环境中的或前代的、为了金钱而占卜谋生的巫媒区分开来。

陈来在探讨儒家思想起源的论述中，也强调了儒家文化与前代巫文化的伦理性断裂。他引证《论语》“子不言怪、力、乱、神”说明孔子与前代巫文化的紧张^[10]¹¹。又引证孔子晚年所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11]，说明正是用仁义德行的践履来求福吉，而非占卜来求福吉，是早期儒家区别于前代巫文化的关键^[10]¹⁰⁻¹²。英国旧约专家罗理(H. H. Rowley)则将古代以色列先知在明晰的自觉意识下所接受到的上帝的“启示”，与孔孟等儒家圣贤自觉“受命于天”的内在觉悟相提并论^[8]¹⁸⁻²¹。同时他又非常正确地指出两种文化现象的巨大差异：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孔子有古代以色列先知那种“神灵附体”或“神游象外”的迷狂举动^[8]¹⁷。

(四) 先知话语的核心内容：公义

在分析了上述先知书文体的“神言”特征后，我们将进入到这些“神谕”所表达的核心内容中。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先知话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强调公义的重要性^[12]。

中文圣经翻译的“公义”概念，常常与希伯来文的两个词有关，这两个词经常并列出现，即，“公平”(mišpāt)与“正义”(sdikē)，英文分别译为“justice”与“righteousness”。“公平”(mišpāt)常指士师或审判官应遵循的准则。“正义”(sdikē)的字根意思为“直”，引申为行为的准则^[13]。这两个词的合用构成了先知传统强调“公义”的核心内容。仅以《阿摩司书》为例：全书中有三处两个词合用(5: 7; 5: 24; 6: 12)，一处使用了“公平”(mišpāt, 5: 15)一词。其中仅仅在第5章中就三次出现“公平”，两次出现“正义”这个词，占全书出现次数的七成多。这个词构成了第5章，也构成了全书的中心题旨。尤其在《阿摩司书》5: 21-24的经文段落中，特别强调了公义对于正确的信仰生活的至关重要性：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
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
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
我却不悦纳，
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
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
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在这段经文中，上帝通过先知的口，所表达的实质是上帝自己的自我言说，上帝说：离开了公义的崇拜仪式是没有意义的，自己惟一的要求是：“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换言之，上帝自己的公义本性决定了先知传言对人的公义要求。强调公义对于信仰生活的至关重要性的内容也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其他先知的预言中(《以赛亚书》1: 11-17;《弥迦书》6: 6-8)。

因此，在希伯来圣经中，公义的概念，表达的不仅是人的伦理行为规范的准则，而且同时也是上帝的本性和本质的这样一个超越性的层面。有了这个超越性的层面，也就具有了对世俗行为进行评判和批评的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了对世俗王权和宗教机构进行批评。根据《阿摩司书》7: 10-16的散文叙事，先知正是由于以此公义标准批评世俗王权和已经世俗化了的宗教机构而被驱逐出境的。另外，在《阿摩司书》5: 7-17这个经文段落的上下文语境中，“公义”的主要意思是指：衡量和判断“公平”准则的司法制度，为了金钱而被扭曲；这个司法的“曲”与“正义”(sdikē)这个字根的意思“直”，正相对立。而在7: 7-9有关“准绳的异象”中，上帝用“准绳”的“直”来测量以色列的城墙，正是为了说明因为以色列的不“直”、不公义，所以上帝才计划将其毁灭。

总之，“公平”与“正义”这组词，最初可能与司法断案的准则有关，在先知书中，则被扩大应用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国际关系”领域(《阿摩司书》1-2章)，成为衡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一切社会生活的伦理准则。并且，根据古代近东的文化传统，神要求君王担负维护社会公义的重要职责(《诗篇》72)，因而在先知书卷中所强调的公义内容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至少包括了以下多个方面：1)上帝的本性和本质；2)上帝创造宇宙时，放入宇宙中的普遍法则；3)上帝对世俗国王履行君王职能的根本要求；4)一般人的行为规范和伦理标准；5)先知对未来“弥赛亚”盼望的重要内容^[14]。

三、中西言说方式的差异与伦理精神的异同

近年来，中西文化比较的热潮方兴未艾，如同邓晓芒所言：“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

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15]。笔者深感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学者将更多的比重放在希腊文明，而对希伯来文明较少着墨，故试图在希伯来先知与孔子伦理观和言说方式上进行一些比较。

自从韦伯以其“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对儒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新教经济伦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后，对不同文明进行分类比较的“类型学”研究就深受欢迎。韦伯的研究，基本上将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划分到“哲学学派的创始人”的类型行列，以区别于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先知”类型^{[4]54-55}。瑞士学者孔汉思（Hans Kung）也从宗教类型相互区分的视角指出：孔子所代表的哲人宗教和哲人文学，与以色列先知所代表的那种先知宗教的类型和文体并不相同。他批评英国旧约专家罗理在对这两个宗教传统的比较研究中，犯了把一种宗教类型归入另一种宗教类型的错误^[16]。无论是韦伯，还是孔汉思，都强调了中国儒家的孔孟圣贤与希伯来先知在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及其在经典文本表述和言说方式上的差异。下边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地界定这种差异性。

（一）言说的三种不同方式

前边我们提到希伯来先知预言作为“神言”的文本特征，这个特征突出表现为“上帝说”、“神说”、“耶和華如此说”。我们也提到孔子《论语》文本中的“人言”特征，这个特征突出表现为“子曰”。在克赛诺封关于苏格拉底的《回忆录》中，苏格拉底言说的经常方式是问：“什么是……”例如：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公道？什么是刚毅？什么是治国之本？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言说虽然同样作为“人言”，但侧重点却有所不同。邓晓芒在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的不同侧重点后，所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他指出：《论语》中更多的是学生向老师发问，学生问，孔子答。孔子的位置始终是一种高位，一种居高临下的表扬，或者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形成了“子曰”这种“语录体”的权威性。苏格拉底则常常是自己提问题，所提问的对象也不限于自己的学生，而是很广泛的阶层，答案也不是事先就想好的，在逐渐深入的一问一答中，才能深入到逻辑本质的“下定义”阶段，因而形成了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哲学文化以“求真”为旨归的逻辑标准和后世以逻辑化语言构筑的哲学体系^{[9]137-202}。如果说“神说”、“子曰”、“什么是……”^[17]分别代表着古代希伯来、中国、希腊文化中的形式化了的三种不同言说方式，那么，希伯

来“神言”的言说方式，在反观本民族文化传统时究竟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或冲击呢？

（二）“我与你”——希伯来先知言说方式的独特性

希伯来先知的言说方式的最大特点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对话，不是大臣与君王的对话，也不是同市场上遇到的不同人的对话，而是上帝与先知之间的直接交流。这种对话方式，是希伯来先知所独有的。虽然苏格拉底也提到他的朋友凯勒丰向德尔斐的神提问（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21A-23C），但并没有留下神与苏格拉底之间直接交流对话的希腊文本。虽然屈原曾经有过“天问”，但是“天”并没有回答；虽然《论语》记载孔子“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也没有留下“天”与孔子之间的直接说话的文本。古代希伯来先知与上帝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直接对话的独特交流方式，曾被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布伯（Martin Buber）精炼地概括为“我与你”的亲密关系模式^[18]。

下边我们需要举例说明这种“神人对话”的交流模式在型塑古代希伯来人的伦理思想时的作用。在《阿摩司书》第7章关于“蝗虫”与“火灾”的两个异象中，就生动地反映出了先知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对话关系。在第一个异象中，上帝准备用“蝗虫”吃尽种植物，来惩罚以色列的罪恶（7：1-3）：

我就说：“主耶和華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華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在第二个异象中，上帝准备用“火灾”，来惩罚以色列的罪恶（7：4-6）：

我就说：“主耶和華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

耶和華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上帝也会“后悔”，改变心意和决定，否则就成了一意孤行的暴君。并且上帝还会容许和邀请人们同他辩论（《以赛亚书》1：18），上帝还会“忧伤”（《创世记》5：6）。

《阿摩司书》中这种先知和上帝之间、神和人之间对话关系的描述和言说方式，在更后期的先知书卷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尤其是在《约拿书》中，通篇都是围绕着先知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和紧张关系展开叙述和情节的。这本书可以视做先知传统对自身传统的自我批评和反思。故事解构了经典先知书中常有的先知听耶和華的话的主题，以及先知总是对的主题。故事中的先知约拿一反常态，“耶

和的话”第一次临到约拿,耶和华让他向东,他偏偏向西。耶和华让他去宣布对曾经灭亡北国以色列的敌人——尼尼微城的警告,他宁死也不从命,因为他希望尼尼微城没有听到警告而灭亡。耶和华就如他所愿,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他,让他死。结果,他为了活命,就赶紧祈祷称颂耶和华并愿意执行耶和华的使命,耶和华就让大鱼吐出他。“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他被迫跑到尼尼微城去宣布警告,但是他衷心地希望敌国的人都不悔改,而被耶和华彻底灭绝。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敌国的人们统统都悔改,甚至连牲口也悔改。约拿非常恼怒耶和华由此改变初衷,不将毁灭的灾害降在敌国。所以,约拿对上帝发火,直接的起因是上帝安排一条小虫咬死了为他头顶遮凉的蓖麻叶,约拿死活就要寻短见。下边是上帝与先知之间的有趣对话(《约拿书》4: 9-11):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和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里的上帝,反映了超越人类局限的慈爱;这里的约拿,与其说反映了先知的神性,不如说反映了人性的自私,人类的狭隘和局限。正是设定了上帝这个至高者的完备和完善,才有可能对比映衬出人类的狭隘和局限。上帝作为无限和奥秘,是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把握的;上帝的心思不同于人的心思。但是,正是在与这个“无限永恒者”的开放性对话和互动中,人类才有可能看清自己的自私和狭隘,才有可能将自己从各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向着超越这些中心主义的某种神圣永恒的层面开放。因为希伯来先知传统设定了一个在我们儒家传统中很难看到的“绝对的他者”作为参照系,在这个“绝对的他者”——上帝的完美强光的对照下,才能映衬出人类自身的自私、罪性和局限。这或许正是以“神言”为特征的希伯来先知传统对我们自身以“人言”为特征的儒家传统最具冲击力的地方。

四、结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在本文结尾处,笔者想强调古代希伯来先知这种独特的“神言”的言说特征,与中国古代的孔子言

说特征不同,以及带给我们的启迪。首先,无论是孔子的言说特征,还是苏格拉底的言说特征,似乎都缺乏先知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这个层面。虽然,孔子与“天”之间可能也存在默默的情意或感通交流的层面,但是在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鲜有“天”与儒家圣贤之间“一来一往”的明显说话的文本记载。其次,希伯来先知传统因为有了与上帝直接对话、交流的这个超越层面,上帝才可以亲自批评先知约拿,直接指出先知也会出错,甚至还会有假先知(《耶利米书》23: 18, 21-22)。因此,这正是先知传统具备超出自身的自我批评、自我超越的“神言”高度。相比较而言,我们也希望在儒家传统中,能够读到“上天”批评儒家圣贤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也有假圣人、假尧舜的儒家传统的自我批评、自我更新的超越力量。毕竟,有无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能力,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文化系统,能否具有高度成熟智慧的标志。自觉的文化批判和反思意识,是我们这个以“人言”为主的、陶醉在“人人皆可以成尧舜”的自我表扬中的儒家传统,最需要从上述“神言”为主的希伯来先知传统中学习的东西。从根本上讲,上帝通过先知为中介而与君王、百姓订立了有着严格性伦理要求的“约”关系,是上述希伯来先知言说形式和伦理内容的基础。除了伦理内容上着重强调上帝的公义、慈爱^[19]外,一些希伯来圣经学者也正是从上帝的“神言”对“人言”的批评和挑战的“言说形式”的高度,强调了这种自我批评、自我改进的文化反省意识,是希伯来圣经经典带给人们最有价值的启发之处:

圣经中有很多反映冲突着的思想观念的声音。它“显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父权制,精英主义,国族主义;它还以讽刺和对立的声音显示给我们这些思想观念的脆弱性”。因此,这些文本“揭示出一个需要补救和治疗的世界以及一个需要改变的世界观。这是一种可以改变我们的阅读。假如我们认识到圣经中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其中的人们是人,并且因此有着人的局限,它的社会制度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们或许对我们自己所处的破碎世界,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局限,我们自己社会制度的不完美,可以看得更清晰。谁知道呢?或许我们会呼唤自己去做改变的带头人。”^[20]

致谢:本文根据笔者参加2011年5月10-12日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发言稿修订而成,感谢梁工、陈声柏、韩思艺、黄芸、谢伊霖、贺志勇、赵法生诸君会上富有启发性的提问及会后的商榷。

参 考 文 献

- [1] 朱维之. 圣经文学的地位和特质[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4): 45-49.
- [2] 任继愈, 卓新平, 主编. 基督教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314.
- [3] 摩西·迈蒙尼德. 迷途指津[M]. 傅有德, 郭鹏, 张志平,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354.
- [4] Weber M.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 [5] Wilson R R. Prophec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Israel[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0.
- [6] Petersen D L. The Prophetic Literature[M].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 5-8.
- [7] 萧俊良 (Seow choon-leong). 希伯来文法[M]. 费英高 (Floytsvik Ingvar), 等译. 台北: 中华信义宗神学院, 2001: 311-325.
- [8] Rowley H H. Prophe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Israel[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6.
- [9] 邓晓芒.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M]//邓晓芒. 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
- [10]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11]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G]//道家文化研究: 第三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12] Mays J L. Justice: Perspectives from the Prophetic Tradition[G]//Petersen D L, ed. Prophecy in Israel: Search for an Identity. London: SPCK Press, 1987: 144-157.
- [13] Woinfeld M. Social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M].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95: 32-33.
- [14] 李焯昌.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J]. 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暨基督教中国文化研究社通讯, 2008(4): 2.
- [15] 邓晓芒. 新批判主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44.
- [16] Kung H, Ching J.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M].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110-111.
- [17] 王路. “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1-45, 370-436.
- [18]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陈维纲,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7.
- [19] 姜宗强. 父母之爱——《何西阿书》第11章的翻译和诠释问题[G]//张庆熊, 徐以骅, 主编. 基督教学术: 第八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9: 107-127.
- [20] Gunn D M, Fewell D N.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4-205.

The Ethic and Speech Forms of Hebrew Prophets

JIANG Zong-qiang^{1, 2}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2. Research Centr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God said”, “Confucius said” and “What is...?”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ree different speech forms in the ancient Hebrews, Chinese, and Greek culture. The Chinese and the Greek forms of speech seem to be lacking in the textuality of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nly God.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exts of Hebrew prophetic books and Confucius scriptures, maintains that the speech form and ethic of Hebrew prophets throw light on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thic.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scholars put more emphasis on comparing Confucian scriptures with ancient Greek philosophic works, while ignoring the relation of Confucian scriptures and Hebrew prophetic books.

Keywords: Greek culture; Hebrew culture; Hebrew prophet; ethic; form of speech; Confucius

(责任编辑: 李向辉)